

目錄 Contents
11 | 2010

- 如何在社交媒體實踐電子公民參與？ / 胡俊明 p. 2-3
- 陰天的太陽一晚近的青少年文化觀察 / 鄧小樺 p. 4-5
- 流動影片的發展和製作人的關係 / 何緯豐 p. 6-8
- 傳播書刊介紹：《Public Journalism 2.0》 / 李夢 p. 9
- New Online Tools Usher in Golden Age of
Global Muckraking** / Sheila S. Coronel p. 10-11
- 如何更有效地向青少年宣揚健康飲食的訊息 / 曾良倫、陳家華 p. 12-13
- 在汪洋裡尋覓立足之地：談里斯本公共廣播國際聯盟年會 / 陳耀華 p. 14-15
- 國際會議呈現華語電影工業研究新方向 / 彭侃 p. 16-17
- 十月傳媒記事簿 / 梁麗娟 p. 18-17
- 傳媒參考資料 p. 20

www.rthk.hk/mediadigest

《傳媒透視》網上版提供分類搜索及各期文章閱覽

MEDIA DIGEST online version provides category search and archive of all articles



《傳媒透視》由香港電台出版，機構傳訊組編製。查詢及來稿，請聯絡執行編輯張玲玲小姐。

MEDIA DIGEST is published by RTHK and produced by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Unit.

Enquiries and contribution, please contact Managing Editor Ms Mayella Cheung.

電話/Tel: (852) 27941677 傳真/Fax: (852) 23384151 電郵/Email: cheungll@rthk.org.hk



如何在社交媒體

隨著facebook的會員人數突破五億，社交媒體(social media)的重要性，由從前的「應否採用」，轉到今天的「必須使用」，及「如何善用」的議題上；商業機構如是，政府部門也急起直追。香港特區政府親歷高鐵一役，開始意識到社交媒體的「威力」，希望透過社交媒體，進一步提升電子公民參與(e-Engagement)，建構所謂「政府2.0(Government 2.0)」；然而，目前為至，綜觀政府各部門使用社交媒體的情況，有幾點值得拿出來討論：

- 未有充份掌握社交媒體的精神，簡單而言，就是「有形而無神」；
- 過份集中在facebook，忽略其他類型及具本地特色的社交媒體；
- 內容策略錯誤，無法走出傳統宣傳的桎梏。

社交媒體的精神價值

社交媒體所以能在這五、六年間大行其道，究其原因，關鍵的應是這些媒體宣揚的「平等」精神。無論我在facebook，又或是微博上，只要啟動了戶口，每個會員所享有的功能大抵相同，微軟主席蓋茨(Bill Gates)在Twitter的戶口，跟我的沒有分別，而我更可以追蹤蓋茨的最新消息。

在社交媒體裡，每個人擁有的是「身分」(Identity)，而非「等級」(Hierarchy)，無論你是億萬富翁，還是政府高官，又或是黃毛小子，各人享有的發言權是均等，絕不會因為你有錢，所以可以多說幾句，即使貴為美國的奧巴馬，也不能阻擋其他人在社交媒體的批評，人人有權發言，不論地位、智慧高低與否。

偏偏這精神與中國傳統背馳，由古至今，中國社會的為官者往往愛以自身的官職為榮（準確一點，應該是虛榮）。因為尊貴如斯，卻要跟張三李四溝通交流，難免總覺得社交媒體的留言都是「感情用事」，沒有「理性討論」，然而，官員們有沒有想過，他們服務的大部分就是這些「感情用事」、「知少少」的市民，與其試圖在社交媒體找「理性討論」的網民，為甚麼不想辦法來說服「感情用事」的網民呢？

由平等衍生出另一個社交媒體的精神就是「分享(Share)」，相對於分享，就是「宣傳」，不僅是政府部門，即使是商業機構，若然希望在社交媒體取得宣傳效果，便先要放棄「宣傳」這觀念。

也許你會質疑，各大小社交媒體也是以商業掛帥，怎麼就不能打正旗號進行產品、服務或政策宣傳呢？社交媒體故然是商業性質，但參與社交媒體的受眾卻非為商業而來，他們在社群內溝通、交流、分享，打一個譬喻，一群朋友在咖啡店坐下聚會，各人閒話家常，忽然有個人走來，說是某某的朋友，各人勉強讓他參與，他不僅沒有好好利用機會與他們攀談，建立關係，更忙不迭拿出產品來推銷一番，假若你身處其中，必定異常反感。

社交媒體的精神正是如此，違背這原則，只管在社交媒體單方宣傳，便註定失敗。回看六月時，特區政府的「起錨」政改活動，沒有好好利用各社交媒體來達致溝通分享，反而淪為政改的「硬銷場」，只見一片紅藍圖象，強求市民支持，卻沒有專責人員與市民「分享」政改詳情，更沒有疏導民怨，實時溝通，自然無法避免掉入鬧劇一場的坎坷命運。

社交媒體不只限於facebook

Facebook獨步社交媒體的趨勢似乎已成定局，但作為使用者，我們不能被個別社交媒體牽著鼻子走，應該因應自己行業需要、產品及個別活動特性，選取合適的社交媒體；例如想要進行實時追蹤報道，使用微博的效果便更為顯著，個人覺得特區政府各主要官員，包括特首及各局長，均應該開設微博，實時上載每一天工作行程，並且透過留言，披露各局的政策諮詢和實施情況，就好像民政局推出申辦亞運會諮詢，事前毫無線索，一般市民只會覺得特區政府沒有深思熟慮；假如透過微博讓小部分的「追蹤者」得悉端倪，從其中測試民意，再加以修正迎合，政策推出時，自然不會予人特區政府「自把自為」，減少市民覺得政府「黑箱作業」等無謂猜測。

實踐電子公民參與？

內容才是王道

使用社交媒體時，商業機構跟政府也常會犯下這個錯誤，就是忽略了內容策略(Content Strategy)。

甚麼是內容策略？簡單而言，就是因應目的、對象特性而決定創作及發佈怎樣的內容，同時，若這些內容用作在社交媒體發佈，便更要謹記「真實」和「非正規」兩大原則。

想要清楚社交媒體的內容策略，第一步就得先把市場推廣材料棄掉，甚麼新聞稿、演詞和海報等，統統派不上場；為甚麼？因為在社群裡，大家希望看到的是真實的東西，或者正確一點，是沒有距離的東西。

舉例而言，最低工資儘管未有定案，但在諮詢過程裡，市民目睹的全是功能組別議員、商會與各大小工會的拉扯，特區政府的官腔濫調，而究竟最低工資對各行各業，對小市民生活的影響如何，報道略嫌不足。特區政府似乎弄錯了，立法設立最低工資的關鍵不在工資的高低，而是最低工資的設定能否改善低下階層市民的生活，普通市民關心的只是事實，而不是爭論不休的數字，包括企業盈利、就業比例，假如明白箇中道理，若想在社交媒體進行電子公民參與，便要製作與最低工資相關的企業、個人個案，從生活角度讓市民認識最低工資設立的目的和方向，以人與事來感染，比冷冰冰的數字和政策條文來得真實，更搔到市民癢處，這樣才可以吸引他們討論，真正或另類民意(沒有被功能組別或政黨、工會影響的)才有望收集回來。

電子公民參與的成功關鍵

想要在社交媒體上實踐電子公民參與(e-Engagement)，有三項原則必須謹記：

(一) 實時——社交媒體之所以如此吸引，與信息實時發佈有密切關係；網絡社群有一共性，就是希望能第一時間獲得消息，反而消息的質量卻成為次要。當然，任何政府部門發佈的消息不能馬虎了事，但為求實時，有時候也可以因應取捨，在主流信息外，加入一些軟性、實

時的政策、部門消息。

(二) 透明度——政府的透明度無可避免地與市民的支持率掛勾，目前特區政府面對各方責難，究其深層原因，不外乎市民對政府運作、政策執行等茫無頭緒，往往只見其結果，無法窺探其過程。特首倡議成立「關愛基金」，假若能善用社交媒體，將是凸顯政策透明度的一個契機；市民一定十分關心這個90億的基金花在甚麼地方，特區政府大可在社交媒體，利用圖表，經常更新基金的來源及去向，同時歡迎各社群用戶參與討論，這樣，變相由市民監察基金運作，大大避免未來各種不必要的爭拗。

(三) 忍耐——以上兩項都是形式，只要花點時間，聘請專人處理，大抵也不會差太遠；然而，此項卻是心理素質問題，不是一時半刻可以改變過來，尤其是官員的「官」念根深蒂固，對社交媒體內部分偏激、「玩針對」的留言，免不了嗤之以鼻、氣憤難平。其實，社交媒體存在一種不成文的態度及秩序，各用戶並非想像中那樣容易受人煽動，他們對部分流於片面、謾罵的留言也不屑一顧，正如我指導商業機構管理社交媒體時，也強調不要太執著某幾個無聊的滋事者，假若他們的指責是誣陷，更不必與他爭持下去，其他用戶是具有智慧的，他們不致於盲目附和。因此，特區政府使用社交媒體時要「一視同仁」，與用戶打成一片，包容來自五湖四海的用戶，忍受某些無理批評，相信只要堅持一段日子，便能去蕪存菁，得到社群支持，並獲得寶貴意見。

使用(Use)和管理(Manage)是兩碼子的事，使用社交媒體不是難事，花一個下午坐在電腦前，大概也能掌握某幾個關鍵功能，但能否妥善管理，達到預設目標，則殊不容易，商業機構以利誘，也不能一蹴即至，更何況是向受市民冷待的政府工作。特區政府想在社交媒體上推動電子公民參與，方向正確，無容質疑，但心理未準備好，策略欠奉，要有所成績，路仍漫長。

【+】 胡俊明
新媒體內容項目顧問

陰天的太陽——晚近的青年

香港電台節目顧問團會議今年以青少年節目方向為題¹，我受邀發言，深感惶恐；但自己對於節目製作是外行，只能就自己讀書所得，及近年與青少年的接觸，提出幾點對青少年文化的觀察，供實際製作構思的人員參考。



青少年是一種變動中的動物。他們的好惡愛恨往往輕易被激發，但卻又不是難以扭轉。表達方式、立場及態度，往往馬上影響他們對於訊息的接收，甚至會導致適得其反。然而我們作為成年人，應該可以更客觀和沉潛地，延遲自己的判斷，首先理解他們，再針對他們的傾向而作出導引和啟發。以下拋磚引玉。

不想長大

回想起來，我自己成長的時候，是相當期望長大、得到與成年人相同的待遇的。11歲之後我已經不想去兒童圖書館，亦看厭了兒童節目，大膽跑到成人圖書館去，煲古裝劇，最喜歡去的商場是西港城。比我更老一輩的人，則更早地開始了他們文藝青年的生命，更何況車衣養家的工廠妹一代。以前，兒童和成人的界線是模糊的，兒童被理解為「小大人」，成年人喜歡觀察並且指出兒童早熟的部分。而這種無視界限的衝勁，反過來成就了上幾代兒童的夢想能量，以及集體氣質中的自信。

反過來說，千禧年後的兒童，以至於青少年，他們的集體情緒是不想長大。他們成長於兒童與成人界線分明的年代，但這些界線卻沒有建起保護牆，抵擋「長大」的憂慮。當代兒童的成長充滿額外的補習與興趣班、競爭和汰選，空閒時間被分割填充，甚至有比成人更深重的憂煩。許多中學生，甚至大專院校的學生，「成年」對他們而言不意味著對自由的期許，而是更多他們無法掌握的負擔。我遇見的青少年中，大部分都流露出「不想長大」的情緒。這種情緒也流露在他們喜歡的商品和流行文化中。

認渣、認衰、認廢

我生於七十年代末，同齡的朋友都有一種深植於心底的欠缺自信，不喜歡大膽說出自己的意見，經常感到自己有缺陷而會被遺棄，不想站於舞台中心，隱藏自己的能力和成就，甚至在情感關係上亦多因此而生波折。但在晚近的青年群中，這種欠缺自信的心態變得更為浮面。我發現，「認渣、認衰、認廢」，已經成為他們的語言風格。

比如在網上遊戲世界中，我曾見過多次這樣的閒聊：他們不是互相比拼能力誰高，而是信口地搶著聲稱「我最廢」，整場閒聊會變成「鬥廢」的過程。而有趣的是，他們的能力其實很高，他們自稱「廢」的描述其實並非事實，甚至未必是他們心中真正的想法。也許有人會覺得這不是一種健康的現象；但青少年這樣自稱，是因為他們覺得這樣說比較安全、甚至比較坦白和討好。我在此觀察到的，並非真是青少年能力上的「廢」，而是此族群的某種心態和語言習慣。

自戀世代

公平點說，「自戀」是當代跨國度、跨年齡的現象，整個商品文化都是鼓吹一種自我中心和自我感覺良好的表達形式，並非只得青少年自戀。不過青少年在成長期，比較敏感和尖銳，又未受太多社會規訓，其自戀性質更易浮面。

「自戀」的意思，就其神話本義，是美少年納西緒斯（Narcissus）在湖邊看到自己美麗的倒影而戀上，徘徊不肯去，絕食至死，被神祇化為水仙花。自戀的通俗意義就是想看到自己的身影，顧影自憐，自我陶醉。不過臨床心理學認為，自戀並非是自我捍衛的self-defensive這麼簡單，更確切地說，自戀是無法分清自我與他人的界限，它經常表現為脆弱（卻又難以動搖）。

當代青少年確實比較渴望看到自己的身影。自拍、喃喃自語的部落格和碎碎唸等文化

1. 香港電台節目顧問團2010年度會議於10月30日舉行，主題為「尋找八九點的太陽——青少年及兒童節目路向」。

文化觀察

形式，強化他們這種傾向。在資訊爆炸的自戀世代中，「新知」未必能引起他們的注意，熟悉及與自己相關的事物，才能引他們一看。英國社會學家施耐特（Sennett）認為這種文化與大都會的共融性相反，並會引致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衰落。他們經常縮在自己的世界裡，卻因為無法分清自我與他人的界限，所以人際相處並不順利、諸多磨擦。他們覺得自己很怪，但卻不見得能夠接受與自己不同的怪異。我竊自認為，香港近年整體社會的保守化和村落化，對於他者（other）或陌生事物的不接受，也是一種自戀的病癥。就文化藝術來說，自戀可以激發表達和創作，但是近年青少年的確少談「能否與他人共同生存」，而更關心「我能否保護自己的特性而生存」——這與社會整體傾向是一致的。不過，又反過來說，這種著力保護自己天性的傾向，又有助催長新生活方式如慢活、樂活、社區文化、自主農業等。

不相信遙遠的權威

青少年與權威的關係一向很弔詭，他們反叛權威，也容易崇拜偶像。不過與五四式質疑權威的一代不同，活在商品包裝文化公關世代的年輕人，因為對於過多的「代言人」文化存在反彈，也因為八卦周刊和網絡文化的「潑糞」文化，他們更不相信遙遠的權威，會認為一切都是遠觀的美好、近看皆不然。他們更傾向相信認識的、親近的人的推薦，將自己對對方人格的體認、情感的認同，投射到對方的話語內容上。他們也喜歡一種「非正式」、似是而非的話語，正正經經四平八穩的推薦，其受信任的程度已日漸減低。

以諧擬為創意

我經常教青少年寫作，以前我們會很有意識犯禁和挑戰既有規範，不過現在的學生，普遍對於「犯禁」這概念本身，並不感到刺激。相反，他們喜歡挪用既有框架，以模仿的形式創作，卻會呈現出某種與規範相衝突的創意。舉例來說，我們以前要明白韓少功的《馬橋詞

典》如何挑戰了詞典的普世性、客觀性和真實性，才懂得欣賞這本詞典小說；現在的青少年對於各種概念和規則不甚了了，但叫他們依照詞典的形式去自造新詞，他們卻做得津津有味，而且非常活潑。這可能是後現代的諧擬（parody）風氣所致，惡搞、調侃大行其道。青少年需要一個既定框架去讓他開始創作，他們也喜歡一些模擬他們熟悉的形式惡搞物，比如惡搞的模擬試題、扮成新聞報導的虛構作品。知名博客小奧（他本身以前曾是香港文化界的一位重要人物）說過一句話：「以前的人抄襲是為了創作，現在的人創作是為了抄襲。」我覺得切中了時代感性的核心。

小結

需要補充的是，以上幾點雖是本人的誠實觀察，但並不代表本人認為香港電台作為公營傳媒機構，就必須像商營電台那樣致力討好受眾、拋棄一切原則與標準。但是，對青少年的引導，可以用青少年受落的形式，去承載規勸他們的內容。極端例子是近期大熱的日本電影《告白》，完全用青年人習慣的影像形式去表達仇視青年人的成年人訊息，而青年人極之受落。因此，找出日漸隱蔽的青少年族群，以他們理解的方式去接觸、引導他們，是公營傳媒應有之責。



以上所說有點負面陰暗（筆者承認對此抱有同情），未必合乎某些人對青少年的感覺和印象。近年來，感覺到香港世代之間的嫌隙甚深，許多成見是因為時代感性差異、表達方式差異所造成。如果香港電台能以客觀、開放、持平的角度去建構平台，讓不同世代的文化得以交流，互相學習（其實成年人也應該有向青少年學習的胸襟呢），當是社會之福，也可融聚分裂的社會，向前邁進。

鄧小樺
文化工作者

流動影片的發展和製作人

要 界定流動影片，必須先瞭解以下幾個關鍵詞的含義：

一、「流動」界定了影片的內容傳播方式為包括了手機播放平臺的無線互聯網，即傳播方式及終端。

二、「影片」界定了其影片的長度、質素以及播放格式，流動影片必須要適合通過手機平臺傳播並適合觀看。若格式不符合手機平臺播放、字幕不足夠清晰、時間太長，都無法符合對流動影片的要求。

三、流動影片的「拍攝手法及器材」則包括了膠片、數碼、高清、三維、手機、攝錄機等方式。由此可見流動影片的範圍非常廣，未必需要以手機拍攝。而我們日常所接觸的手機視頻，都屬於流動影片。

所以流動影片可被定義為一切能通過手機平臺傳播，並適合觀看的視頻內容。

井噴式的市場環境

流動影片在中國先進的市場可以被稱為是井噴式的，隨著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人們對信息需求日益高漲，流動影片的市場趨勢也水漲船高，處於蓬勃發展的階段，中國無線增值業務的市場潛力極大，蘊含巨大的商機，市場前景不可估量。

在中國，手機用戶將近9.2億，平均每人每天攜帶手機時間為14小時。其中，68%的用戶曾經通過手機上網，同時47.3%的用戶平均每天通過手機上網2小時。有76.2%的用戶表示有嘗試使用手機電視業務的意願。這證明手機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習慣，通過手機獲得信息的方式也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手機已不僅僅限於一個通訊工具，而更加逐漸變成一種新型的媒體平臺。而作為國內三大運營商中最大的運營商——中國移動於上海建立的視頻基地，預計在2010年的總收益為5億元人民幣，明年計劃收益則為12億元。這證明在未來手機的多媒體內容服務將成為手機媒體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無線媒體中的手機視

頻內容服務，也將成為無線業務中最核心的應用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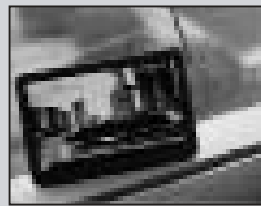
流動影片除了擁有強大的市場潛力，更需要有優秀的手機視頻產品以及手機視頻媒體銷售平臺作為管道，向使用者提供服務。現今我們提供的產品有：手機WAP網站推廣、手機視頻客戶端推廣以及互聯網門戶營銷。而服務包括手機視頻內容集成與製作、手機視頻業務營銷和手機視頻廣告投放三類。

手機視頻的目標用戶，被定位為電視媒體用戶群和互聯網視頻使用者群。電視媒體用戶群經常通過電視收看直播節目，對體育、新聞、影視、娛樂等內容關注較高；而互聯網視頻使用者群則經常通過互聯網，FreeWAP等方式觀看視頻。他們的共同特徵為：年齡18至35歲，為數據業務使用用戶，大多為學生、公司員工以及農民工。由於經濟發達程度、用戶接受新事物程度等差異，現在國內手機視頻業務使用者集中於東部沿海地區，而較少集中於新疆、內蒙古、西藏、青海、甘肅、寧夏、海南6個省份。除以上6省，全國各省在09年累計用戶皆超過20萬，其中12個省份累計用戶超過50萬。現今手機視頻主要應用目的為在無聊時打發時間和及時獲取信息，這兩大需求都可為用戶逐步培養成使用手機視頻的習慣。

手機視頻產業鏈——內容提供商、渠道爭帥印

手機視頻產業鏈由基礎四個環節構成：內容提供商將手機視頻給予牌照方，即通過國家嚴格規控、在廣電總局旗下有牌照授權的公司，他們須經過嚴格審核，保證播控平臺及內容的安全。手機視頻在經過審核後，將通過作為管道的三大運營商或SP公司（互聯網服務內容應用服務提供商）提供給終端使用者，即手機視頻觀看用戶。除了以上四個基礎環節，優秀的技術支持也成為手機視頻產業鏈不可或缺的一環。技術支持不但向不同的手機平臺（如Java, Symbian, Android, Windows Mobile, MTK等平臺）開發不同的適配系統，並需要面向不同型號的手機終端做相對的調整。有了技

的關係



術的支持，才能為手機視頻產業提供良好的終端和服務。

在手機視頻產業鏈中，內容提供商及推廣管道曾出現兩強爭奪帥印的局面。但由於現今市場並未發展成熟，激烈的競爭、推廣模式的限制、產品內容版權的不清晰、從業人員普遍抱有降低成本、快速得益心態等原因，為內容提供形成了一個尷尬的灰色地帶；而同時擁有版權的內容提供商在這種情況下，亦需要投入大量成本監控內容使用。所以在制度不完善、市場不規範、心態不成熟的情況下，內容提供地位較弱，而推廣管道成為產業鏈中更為重要的一環。

但由於2009年底WAP業務全線暫停計費，使得無線互聯網從業人員的頭腦更加清醒。大打擦邊球、灰色內容來謀取暴利的時代已經過去，要想在無線互聯網有所發展，必須有一些新的業務增長點。同時隨著三大運營商相繼在上海建立手機視頻基地，也帶火了手機視頻市場。於是由視頻基地、視頻網站、手機廠商、地方電視台、WAP網站、動漫公司、軟件公司、第三方視頻提供方以及創業團隊九大環節構成現今較為成熟完善的手機視頻行業價值鏈。

現時手機視頻行業正脫離萌芽期，進入快速上升的成長期。在這個階段有如下特徵：手機視頻用戶規模迅速增長、產品和服務質量迅速提升、產業鏈不斷完善成熟。但由於市場環境還未完全完善，導致競爭不是很激烈，同時用戶數量在快速上升，正屬於進入市場的最佳時期。從以下有關中國移動、手機視頻業務整體情況的一系列數據都可以體現無線互聯網、手機電視以及手機視頻業務所展現出的巨大發展潛力。

截至2010年6月，手機網民用戶達2.27億，較2009年底增加了4334萬人。在整體網民中的佔比攀升至65.9%，增幅達18.6%。同時，在2010年上半年，手機網民較傳統互聯網網民增幅更大，成為拉動中國總體網民規模攀升的主要動力。

從09年1月至10年6月中國移動手機電視新增用戶情況中，我們看到18個月中每月最少增加1萬人，最多增加20萬人；新用戶增長率也最多達到200%。

現在，手機視頻業務整體情況為：2010年7月，手機視頻業務整體收入達6500多萬。其中CRI手機視頻業務收入為1100多萬，排名第一；現使用用戶數量為1158萬，其中在訂用戶數為497萬；業務的增長率31%，其中土豆網增長速度為最快，達163%，其次是CCTV，為53%。

手機視頻推廣管道

目前手機視頻市場處於成長期，尚沒有一家公司能夠獨領風騷，這給予市場新入者一個很好的機會。進入市場的先決條件是與運營商的談判能力，而獲取市場份額的關鍵則是優勢資源和稀缺資源。現在市場上已有的牌照方均有自己的資源管道，在版權上基本不構成問題；在商務方面，由於市場機制尚未成熟，所以和運營商位於上海的視頻基地的業務關係是賺錢的關鍵；在產品方面，最重要的問題是版權以及產品是否適合觀眾，必須針對客戶群細分後有目的地選擇產品；在推廣方式方面，手機視頻用戶與網絡視頻用戶的重合，說明網絡推廣在視頻業務發展中的重要性，當然傳統的增值業務推廣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

手機視頻可以通過以下七種管道進行推廣：運營商、互聯網、終端內置、開放平臺適配、SD卡內置、終端銷售商、合作夥伴管道。這些管道以從服務方面、物理方面（內置產品）、銷售方面（塑造品牌形象）相互融合、整合推廣，不但達到覆蓋面廣、針對性強、推廣效果好的效果，更可以加強與運營商、終端銷售商、終端內置製作商等合作夥伴的關係。而手機視頻業務營銷可通過利用運營商事件（即緊跟運營商的營銷策略）、利用社會與網絡熱點組織活動、根據自身資源組織活動、以及推出獎品及優惠措施四種方式。這些營銷方式不但可吸引客戶的注意、激勵用戶購買產品、提高產品知名度、影響力，更可維護用戶對產品的忠誠度。

製作人的出路

早在2003年，筆者已意識到電信運營商應有屬於自己的視頻製作中心，並開始在香港涉足移動流媒體界。最近參觀了中國電信位於上海的視訊運營中心，該中心規模達數百人，制



播檔次亦正式高檔，水平並不輸於國內電視台；同時，如流量、入庫節目等數據監控也相當清晰規範。事實證明，當年筆者這個想法是有遠見的。在2005年，筆者自製並推出了亞洲首部手機連續劇《求愛123》，這種新型的產品在獲得大量社會關注的同時，也爭取了大量客戶，獲得商機。除了為運營商製作優質的作品外，也在逐步拓展業務範圍，不但為移動流媒體集合香港、海外電視節目內容，也製作過多個IVVR手機互動遊戲。

礙於香港市場過小，並且在08年逐步步入飽和、客戶增長速度放緩，同時在08年國內出臺3G的TD-CSDMA技術標準，奧運期間也在部分城市推出測試。筆者開始將目光投向廣闊的大陸市場。相信在未來幾年，隨著技術發展、人們對手機視頻的瞭解逐步深入、手機流媒體界將發揮其蘊含的巨大潛能，大發異彩。

流動影片的未來發展

現今國內為手機視頻提供的投放管道、表現形式也很豐富，如中國移動舉辦的「G客G拍，即刻即拍」活動以及「紅段子網創業大賽」，他們都鼓勵拍客提交原傳作品，並提供手機平臺促進作品的傳播，為作為新型傳播方式的手機視頻提供更大知名度以及影響力。由廣東南方廣播影視傳媒集團、中國傳媒大學主辦的「金花獎」全國新媒體手機影像大賽作為國內原創流動影片拍攝大賽之一，向全國徵集流動影片，並給予大獎。同時，該大賽作為「金鵬獎」中國國際新媒體短片大賽的前哨站、並與香港流動影片節形成合作關係，為國內優秀手機視頻提供了走向國際的舞臺，極大鼓勵了手機視頻製作者的創作熱情。除以上兩



種形式，許多主流媒體欄目也鼓

勵對手機視頻的製作，如廣東電視臺辦的《全民DV》欄目、湖南衛視主辦的《我要拍電影》欄目。雖然以上欄目並未針對手機視頻的投放，但為手機視頻的創作和傳播提供了一定機會。

從2009年起，國內部分知名視頻網站，如優酷網等已開始涉足手機媒體市場，並開展了一系列有影響力的手機視頻推廣活動。在去年，中國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東南方廣播影視傳媒集團等佔有最優資源的幾十家主流媒體亦加入了與手機媒體合作的隊伍。在未來，預計將會有大型品牌加入大軍，並為手機視頻的發展注入更多力量。隨著平臺發展成熟、商機亦逐步顯現，未來手機視頻的業務亮點將出現在手機廣告投放。廣告主可通過手機視頻客戶端的播放器，在用戶點播之前播放相關的廣告內容。這樣的投放方式可為廣告主帶來更加詳細的用戶使用數據，為廣告的精確營銷帶來了更加詳盡的數據，相對其他的廣告投放方式更加有效。

隨著流動影片的逐漸火熱，行業衍生出的一系列網絡服務和流媒體業務悄然而生，如互動視頻行業的發展蘊藏著巨大商機，也會有巨額投資流向移動平臺。在2010年5月21日谷歌公司通過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批准，宣佈以64億(2.2億美元現金和價值5.3億美元的股票完成)收購移動廣告平臺 AdMob。這證明了巨額投資正流向移動平臺。澳大利亞最大的電訊公司澳洲電訊(Telstra)將於今年11月以2億美元收購中國國內最大的無線廣告專家百分通聯，這證明中國移動互聯網的高潮已經來臨。

筆者看來，在流動媒體業界未必可以得到極巨大的經濟收益，但不失為一個挑戰自我、鍛煉個人能力、促使個人成長進步的出路。同時，流動影片業將成為以廣告支撐的媒體式市場。在流動影片發展蓬勃的大勢下，3到5年內，流動影片業將會完善制度與技術、形成一個成熟的行業生態。

何緯豐
南方傳媒手機電視總裁

傳播書刊介紹

書名：《Public Journalism 2.0 : The Promise and Reality of a Citizen-Engaged Press》

編者：Jack Rosenberry, Burton St. John III

作者：Lewis Friedland, Jack Rosenberry, Burton St. John III, Serena Carpenter

出版社：Routledge

出版年份：2010



當前，借由網絡技術的突進與公民自治意識的增強，Twitter和Facebook等公共討論空間內氣氛熱烈空前。自媒體在Web 2.0時代異軍突起，成為設置議程並左右輿論的關鍵力量。前不久，中國江西省宜黃縣政府強制拆遷致使居民一死兩傷的慘劇，正是由某網民借由新浪微博率先曝光的。面對愈來愈多的公民充當起傳統媒體消息源的情形，職業記者應如何面對這樣一個互動傳播環境？公民記者又能否承負起「為民喉舌」的職責？今年初，Routledge出版社推出的這本書，探究了公共新聞(public journalism)在網絡時代的新模式——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試圖以傳播學原理闡釋結合案例分析的模式，逐一解答上述問題。

本書共收錄論文13篇，內容可大致分為三部份：回顧公民新聞的起源和出發點，闡述其現狀及遭遇的困境以及展望網絡時代公民新聞的發展前景。應該說，全書的邏輯架構十分清晰，理論解釋與案例分析亦結合得相當精巧。何為傳播學語境中的「公民參與」(citizen-engaged)？作者在前言中已經給出了解釋：公民新聞，意在鼓勵一個公民參與程度更高的媒介環境的出現，並幫助提升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

二十世紀80年代末，「公民新聞」一詞由時任Knight Ridder報業集團總裁的James Batten首先提出。Batten注意到1988年美國總統大選投票率的降低和受眾關注度的流失，因

而著手改革公司旗下報章，希冀逐漸改變既有新聞報導「沉悶」的單向度模式，加深媒體與受眾的互動程度。Batten的目標是建立報章同所屬社區更穩固更密切的聯繫。

然而，公民新聞其後的發展並不如Batten等人預想得那樣順暢。正如本書作者之一Lewis Friedland所講，到2004年，公民新聞的發展似乎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非但不能持續保有活力不斷創新，反倒在惰性日增的新聞業界中變得無所適從。而且，公民新聞本身並未像某些樂觀的理論家預見的那樣，成為公共討論空間良性運轉的推手，反而令一眾網民愈發沉溺於自娛與自我表達的滿足中。書中介紹的《弗吉尼亞飛行者報》(Virginia Pilot)創辦僅數月便被迫停刊的案例，即是對公民新聞發展困境的極佳詮釋。

其實，作者寫作本書的意圖不單是直面困難，而是要為公民新聞今後的發展設想可能的情境，包括公共與私隱空間的劃分、新聞價值的再界定以及「把關人」角色意義的新思考等等。依本書作者的觀點，公民新聞今後的發展需仰賴職業記者與公民記者的密切合作。二者對於怎樣以公眾利益為基準設置新聞議程等問題的有益探討，將有助於傳統媒介一貫享有的公信力在新型的互動媒介中得到延續。

李夢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New Online Tools Usher in Golden

On the spring of 2010, Alexander Maljutin caused a public outcry when he revealed that the Russian interior ministry was buying an \$800,000-bed overlaid with 24-Carat gold for one of its guesthouses. He found proof of the extravagance while combing through government tender documents posted on the Web.

In Tunisia, Astrubal trolled amateur planespotting websites and discovered that the presidential plane had been photographed in the airports of Europe's shopping capitals. How could that be, he asked, when the president had never taken an official trip overseas? The answer: The First Lady was an avid shopper.

Satellite images from Google Earth helped Mahmood's Den plot the vast expanses of land that had been awarded to 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y in Bahrain. Google Earth also enabled Burmese exiles to locate Naypyidaw, the secret capital built by the country's ruling junta. They uploaded the images onto YouTube, a short clip that showed the palatial homes of junta members and the gigantic swimming pool built by the dictator Than Shwe. Few Burmese have Internet access, so the video was copied on discs and smuggled into the country.

Is this the dawning of a Golden Age of global muckraking?

Since the 1980s, there's been an explosion of exposure journalism in countries that until recently did not even have a free press. The fall of authoritarian and socialist regimes has opened up spaces for accountability reporting, allowing journalists in many new democracies to become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checks on the abuse of power.

In the last decade, new tools like blogging software, Twitter, Google Earth and YouTube have become widely and freely accessible. These have democratized muckraking in ways previously unimagined. Empowered by the Internet, bloggers like Maljutin, Astrubal and Mahmood Nasser Al-Yousif of Mahmood's Den are piercing the veil of official secrecy. Like the nameless Burmese exiles who commit occasional acts of journalism, they show that the watchdog function is now no longer the sole preserve of the professional pres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here's been much wringing of hands about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the US where, since Watergate, newspapers have been the keepers of the investigative flame. With many newspapers at death's door, there's worry about whether they can keep the flame alive.

But elsewhere, democracy and technology are prying open previously closed societies and providing citizens with information that would not have been available to them in the not-too-distant past. From Bahrain to Burma, from Russia to China to Zimbabwe, the new muckrakers are using blogs, mobile phones and social media to expose the predations of those in power. The truth is that, in most of the world, there has not been much watchdog reporting until recently. In these places, therefore, the concern is not so much the business model that would sustain investigative newsgathering.

It's whether journalists and citizens who expose wrongdoing can stay alive or out of prison. Muckraking journalists and citizens have been sued, jailed, beaten up and killed.

In Russia, contract killers have gunned dow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n their homes or on busy city streets. In Mexico, journalists have been murdered by drug cartels; in the Philippines, the assassins have been rogue cops and soldiers linked to local bosses. As watchdogs breach the bounds of what's possible to publish, the backlash will surely be fierce.

Yet, a return to the Dark Ages no longer seems possible. The openings we see today are here to stay and provide us a glimpse of a possible future for accountability reporting.

In an increasingly global and networked world, watchdog reporting will cease to be the monopoly of professional news organizations. It will be a much more open field, which journalists will share with individuals, research and advocacy groups, grassroots communities, and a whole slew of Web-based entities like WikiLeaks, for which a category and a name have yet to be invented.

As commercial media search for a business model, professional, high-quality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will increasingly be subsidized by foundations and the public, and in some countries, even by taxpayers.

Freed from market pressures, nonprofit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centers will be doing groundbreaking reporting. There are already a few dozen of them in Eastern Europe, Africa, Latin America and Asia.

Technology will enable news organizations to produce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investigations using large amounts of data and presented in amazing new ways, especially as governments, compan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make more and more data publicly available.

The future of investigative news will be collaborative. Strapped for resources, news organizations will be forced to

Age of Global Muckraking

cooperate, rather than compete. Joint investigations involving several news organizations, for profit and nonprofit entities, professionals and amateurs, across media platforms and across borders will be commonplace. Crowdsourcing will be the norm, with audiences initiating and taking part in investigations.



Like elsewhere in journalism,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will divide into niches. Communities of interest will form around various areas of watchdog reporting. These could be consumer concerns or national security or something more specific, like watchdog sites to monitor the whaling industry or the safety of bridges.

The future of investigative news will be local, as communities drill down on local concerns. Web-based local watchdogs will set up small newsrooms specializing in accountability reporting and funded by a mix of commercial revenues and community support.

But the future will also be global. There will be much more transnational reporting on such issues as crime, corruptio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flow of goods, money and people across borders. Journalists and citizens will be collaborating across borders like never before, using the tools of the networked information age.

Such collaborations are already taking place; in Europe, Africa and the Arab world, recently formed regional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centers are bringing journalists together to work on cross-border projects. An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has created reporting teams to probe issues like tobacco smuggling and asbestos use.

Watchdog reporting will also likely take on new, unorthodox forms. In China, journalists are resorting to microblogs, posting sentence fragments, photos or videos online, often through mobile phones, in order to break controversial stories and evade censorship.

In the US, advocacy groups are developing mobile phone apps that enable users to have easy access to data, such as Googlemapped government-funded projects or hazardous ingredients in everyday products.

Various ways of providing information will likely emerge, sometimes in unexpected places, like video games. Innov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will characterize this new era.

But the future also bodes more intense clashes between watchdogs and wrong-doers

Yet muckrakers will likely plod on even in the most inhospitable environments. Wherever power is abused, the compulsion to expose wrongdoing will likely remain strong. But so will the determination to quash exposés. If not violence, watchdogs will be subjected to legal bullying. In China, dozens of reporters and bloggers have already been jailed for a range of offenses, including libel and exposing state secrets.

In the geography of threats, cyberspace is the new frontier. Already, the Internet has encouraged libel tourism, the practice of suing journalists in overseas jurisdictions where laws are more onerous, on the grounds that what's published locally has a global audience online.

The great battles between secrecy and transparency will be fought on the Net. As watchdogs expose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wrongdoing, there could be a backlash against openness, with governments clamping down while invoking the need to protect privacy, public safety or national security. There could be some public support for a crackdown if muckrakers report irresponsibly, but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sustain such support once citizens have tasted the benefits of openness. The emerging terrain is one suited to guerrilla warfare. The Internet provides many safe havens. And as the Chinese have shown, savvy netizens find ways to outwit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With the ubiquity of mobile phones, proxy servers and other devices, a total clampdown is no longer possible. Moreover, technology makes it easier to mobilize protest.

Like all journalism, the landscape of watchdog reporting is being radically altered. It will be a contested and uneven landscape. Powerful governments and individuals will try to muzzle watchdogs. Vested interests may fund pseudo-watchdogs to counter those who would hold them accountable. Some places will have a thriving community of muckrakers; others will be bereft.

Some voices will be lost in the wilderness of cyberspace. But many watchdogs will have impact, becoming influential voices in their communities and around the world.

✉ Sheila S. Coronel

Toni Stabile Professor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i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t Columbia University's Journalism School. Previously, she was the founding Director of the Philippin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Manila

如何更有效地向青少年宣揚

過重和過胖為世界各地的青少年造成健康問題，香港青少年過胖的情況亦相當普遍，根據衛生署的報告顯示，小學生過胖的比例，由1997/98年度的16%上升至2007/08年度的21%。香港浸會大學傳播系於2007年進行一項名為「向青少年宣揚健康飲食」的研究顯示，香港的青少年大多於派對上、出外用膳時或朋友一起時，會較常食用不健康的食物；同時，他們更認為家長及政府等較老師及朋輩們，更經常向他們提出要實行健康飲食。

今年度，我們再次進行一個有關中學生實行健康飲食的研究，從而了解可如何更有效地向他們宣揚健康飲食的訊息；有關研究以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為基礎，嘗試找出香港中學生對健康飲食的態度(attitude)、認知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與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等因素，如何影響他們實行健康飲食；同時，這項研究亦嘗試測試那一類廣告呼籲模式較為中學生所接受；並且亦嘗試探討他們對不同體型的人有沒有性格定型的傾向。

計劃行為理論

有關研究於2010年3月以問卷調查形式進行，成功訪問570名本地中一至中五學生。受訪者表示他們經常實行健康飲食，結果顯示超過6成香港中學生每星期至少3次有食早餐及進食一份水果及半碗蔬菜的健康飲食習慣。同時，香港中學生亦有一些不良飲食習慣，受訪者中超過4成每星期至少3次食糖或薯片及飲汽水；食宵夜的情況卻不十分普遍，超過8成的受訪者每星期進食宵夜少於3次。

根據計劃行為理論，計劃行為受到對有關行為的態度、主觀規範、主觀行為控制及行為意圖所影響，是次研究發現香港中學生對健康飲食的行為意圖乃受到對健康飲食的態度、主觀規範及主觀行為控制的影響，調查顯示中學生在健康飲食的態度上是正面的(平均值=3.4)，主觀規範和認知行為控制的得分亦相當高，平均值分別為3.3及3.2，他們的行為意圖卻是一般，中學生普遍認為健康飲食「有益」

和「好」，但略嫌「沉悶」及「不享受」，中學生認為家庭及政府鼓勵他們進行健康飲食，被訪者認為自己有足夠能力進行健康飲食，卻未必有時間及定力，有約三分之一受訪者打算在未來兩星期內進行健康飲食。

調查測試了五個由研究機構設計，模擬由衛生署刊登的平面廣告，嘗試比較5種不同的廣告呼籲模式，中學生們對5種不同的廣告呼籲模式的喜歡程度沒有明顯的差別，但對5種不同的廣告呼籲模式的有效程度則有明顯分別，「新聞式呼籲」對中學生至為有效，相反，「受歡迎式呼籲」則被認為最沒效用(見圖1及表1)。

圖1：



表1：受訪者認為五種廣告呼籲模式的有效性及其喜歡的程度

廣告呼籲模式	有效性	喜愛度
新聞式呼籲	3.4	3.1
恐嚇式呼籲	3.0	3.2
成就式呼籲	3.0	3.1
戀愛式呼籲	2.9	3.1
受歡迎式呼籲	2.9	3.2

5 = 非常有效 / 非常喜歡 1 = 完全沒有效 / 完全不喜歡

健康飲食的訊息

中學生認為新聞式呼籲有效，可能因為他們對健康飲食的資訊最感興趣，而新聞式的廣告能提供最多資訊，所以他們認為宣傳效用最大。相反，其餘的「恐嚇式」、「成就式」、「受歡迎式」等宣傳手法着重健康飲食的後果，例如宣稱不健康飲食就會沒有精神，或奉行健康飲食的人會更成功、更受歡迎等，中學生們卻似乎並不認同。

調查亦訪問中學生認為不同體型的人在性格方面是否不同。問卷向受訪者分別展示一張正常體型的青少年人的照片，以及一張肥胖體型的青少年人的照片，體型正常的列明高度5呎3吋，體重99磅，體型肥胖的列明高度5呎3吋，體重180磅，然後再請受訪者從12種性格特徵中選出他們認為適用於相中人的性格特徵(見表2)。被訪者最多選擇形容體型正常人士的性格特徵為開心(72%)、多朋友(55%)及

表2：受訪者對不同體型的人的性格特徵評估

性格特徵	認為有該性格特徵的百分比%	
	體型正常	體型肥胖
開心	72	36
聰明	49	7
有很多朋友	55	16
學校成績好	29	5
讓人喜歡	54	14
關心別人	21	13
自私	7	20
有自卑感	4	51
懶惰	5	60
漂亮	47	4
無節制	4	68
風趣	27	25

讓人喜歡(54%)。最多選擇形容體型肥胖人士的性格特徵為無節制(68%)、懶惰(60%)及有自卑感(51%)。由此可見中學生對體型肥胖人士的性格定型十分嚴重。進一步分析，更發現男同學對肥胖人士的性格定型更為厲害，例如68%的男同學形容肥胖人士懶惰，而只有53%女同學認為如是。由此可見男同學對肥胖人士的評價更定型化(Stereotype)及標籤化(Stigmatize)，這是一項不容忽視的體型歧視傾向。

調查顯示男同學較女同學著重功能性(Industrial)的性格特徵，如學校成績和風趣等，而女同學則比較留意一些社交性(Sociable)的性格特徵，如開心、關心別人、讓人喜歡和漂亮等。

對香港政府的建議

研究顯示主觀行為控制可最有效估算青少年於健康飲食上的行為意圖，宣傳健康飲食時應著重於教育如何食得健康，藉以提升青少年行為管理的能力，政府及有關志願機構可透過互聯網網站推廣有關訊息，政府更應制定有明確目標的宣傳方案，與愈見獨立的青少年直接溝通。再者，健康飲食的公益廣告應以加強如何使青少年人對健康飲食感到趣味為主，例如鼓勵青少年人於社交網上分享健康食品、健康飲食的經驗，以至推介健康的菜色及餐廳，並以新聞式的呼籲技術，更有效地推廣有關訊息。

研究顯示家長比政府、教師或朋輩更能影響青少年的飲食習慣，故家長應善用這種影響力，向子女灌輸健康飲食的概念，家長們應多花時間與其子女討論健康飲食的價值。

不健康的飲食習慣會引致健康和社會問題，同時為家庭、醫療制度和經濟帶來不必要的負擔。飲食均衡，才能享受豐盛人生。

【➡】 曾良倫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傳播系講師

【➡】 陳家華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傳播系主任

在汪洋裡尋覓立足之地：談

公共廣播國際聯盟(Public Broadcasters International, 簡稱PBI)創辦於1990年,會員機構超過80,遍及全球各地。2010年10月28至29日,一連兩天,來自全球各地40多國共50廣播機構超過120人,雲集於葡萄牙里斯本西部小鎮辛特拉市(Sintra),探究公共廣播的未來走向。遠在15世紀,葡萄牙人投向海洋,南征北討,建造龐大帝國,辛特拉市地靠岸邊,天廣地闊,自然成為遠征的起點及開發新大陸的橋頭堡。今昔對照,資訊世界如無盡汪洋,任何傳媒,無論大小,處身其中,揚帆啟航,大有當年船隊的冒險精神,勇敢地迎向未知的遠方,因而選擇此地召開傳媒會議,更具象徵意義。



今年公共廣播國際聯盟的研討主題為「零碎的傳媒環境：論公共廣播電視的未來」。顧名思義,數碼技術近年迅速冒起,尤其是桌上電腦及流動電話深入民間,對主流媒體造成衝擊,公共廣播何去何從,便是今屆會議的討論焦點。

類似的主题,近年來俯拾皆是,我也不止一次參與,內容多以新媒體為主,鼓勵與會者勇於嘗試,擁抱未來,開創新風,否則便會被對手拋離,溺斃於資訊汪洋之中。我以為今次會議亦不例外,殊不知論調一轉,頗有反璞歸真的味道,介紹各地經驗之外,同時肯定傳統公共廣播的角色及功能。

對照寬頻與廣播

NHK日本放送協會副會長今井義典為今次的主講嘉賓,率先在首日的會議之上,對照寬頻與廣播之別(Broadband vs Broadcasting),

他今年曾經出席歐洲、美國及日本等地舉行的連串會議,其中一次由聯合國寬頻數碼發展委員會(United Nations Broadband Commission for Digital Development)主辦,於9月19日舉行,地點為紐約聯合國總部,與會者聚焦於寬頻的發展,討論如何推廣數碼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可以藉此普及國民教育、落實醫療服務、促進社區互動、預防自然災害及推動工業發展,期望在2015年達至「千年發展目標」。會議之中,人們著眼於如何提高滲透率,令寬頻服務深入至每一家庭,成為全民的基本服務,隨之而來的建造成本及頻譜分配,亦成為討論焦點,有人甚至建議,將已經闕為廣播使用的空置無線電頻譜,撥歸予發展寬頻之用。由於今井義典從事廣播工作,唯有站出來說項。今井義典強調,廣播為「一對多」的傳播模式,已經深入民間,穩固地植根於人們的生活之中,以低廉的成本,同一時間為大量的受眾提供資訊,寬頻及廣播各具特色,必須互相配合,不宜互相取代。他又指出,在頻譜分配的問題上,必須要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因為不少國家仍未啟動數碼廣播。今井義典進一步闡述,縱然寬頻傳送技術極具潛質,新服務不斷推陳出新,幾乎令人以為「無所不能」,不過,傳統廣播機構素來堅持高質素的方向,仍然深具意義,因為缺乏可靠的資訊,傳送載體只是空殼而已。

在此之前十天,國際廣播年會(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Convention)在阿姆斯特丹舉行,主題為:「公共廣播還有前途嗎?」之所以有此一問,不難理解,在全球信貸危機之下,財政緊拙,諸事拮据,再加上新媒體擁現,衝擊舊有體制,有人甚至提出「公共廣播已死」。在該次會議裡,今井義典力陳利害,提出了公共廣播的三項任務:第一,提供高質素的新聞及娛樂節目;第二,提供全民的服務,凝聚社群,增強的聯繫,尤其是面向日趨分化的網絡受眾,更形重要;第三,在推動資訊科技方面,擔當推動的角色,帶導社會邁向數碼年代。踏入新世紀,由於承擔數碼轉換及網絡融合的全新任務,公共廣播的服務的範疇不但沒有縮減,反而不斷擴展。

里斯本公共廣播國際聯盟年會

現在是最好的年代

Chris Forrester為資深記者及傳媒顧問，也是今次會議的特邀嘉賓，他以「現在是最好的年代(The best of times is now)」為題，遙遙與今并義典和應，他認為電視的領導地位未變，但必須緊密地掌握其發展趨勢，才能在新媒體的環境中屹立不倒。他指出美國電視的黃金年代在1940年代末及1961年之間出現，人們迷倒於小小的螢幕，聚精會神地收看，長達一小時以上的電視連續劇極受歡迎。差不多同一時間，英國的電視年代也在1949年至55年之間達至高峰，一直延續至七十年代為止。對於電視的最大挑戰，Forrester指出，始自衛星電視及有線電視的冒起，本來只有少數可供選擇的頻道，突然躍升為十數、數十，以至超過一百的「多頻道環境」。以美國為例，在短短的10年之間，黃金時段的觀眾可以突然減少50%，他們並非放棄電視，改用桌上電腦接收電視廣播，由大銀幕轉移到小銀幕，而是仍然留在客廳，收看其他頻道而已。當中最頭痛的還是廣告商戶，觀眾化整為零，難於掌握；不過，數碼化技術的發展，卻同時讓他們的銷售策略更針對目標客戶，更具成本效益。

Forrester認為，人們使用電視、電腦及流動電話的模式不會有戲劇性的改變，電視仍然魅力十足佔據主導，令人沈浸於享受之中，無法抗拒，其他媒體的螢幕太小，音效太小，無法產生足夠的感染力，因而有所謂「第二螢幕」(Second Screen)的興起，收看電視的同時，可以使用桌上電腦搜尋有關資訊，又或者將精彩節目的短片傳送至同好，成為主流媒體的輔助平台，擔當評議及轉發的角色。

Forrester指出，數碼電視的發展不容忽視，它再不是一個呆笨的小小木箱，只懂得被動地接收影像及聲響，而是具備互動功能，被形容為神奇奧妙的嶄新工具，幾乎與桌上電腦無異。他引述一項市場調查，說明電視的領導地位更為穩固：「在未來五年內發售的電子設施，包括數碼電視、藍光碟播放器和電子遊戲機等等，具有網絡支援功能，估計2014年有137萬件在美國裝運，並有超過1100萬件由運營商供應的混合電視機頂盒，能夠透過互聯

網接收視頻內容(In-Stat, 20 Oct 2010)。」電視已經不是過去的電視，但它仍是電視，支配大多人的收看經驗。

面對全新的挑戰，公共廣播的角色何在？NHK國際放送局長佐藤俊行說：「我們是製作節目(Programme)，不是提供內容(Content)，經過專業加工的內容，才能成為節目，未經提煉的資訊，只屬於沒有價值的內容。」由是觀之，公共廣播的核心價值不變，在於向全民提供多元、獨特及高質素的節目。

新媒體創意之作

綜觀今次會議，儘管多談原則，來自挪威的Eirik Solheim仍然分享了他的新媒體經驗，當中不乏創意之作。其中一項名為「四十秒看一年」，製作人將一年四時的氣候變化，濃縮於四十秒之中，放置在短片分享網站YouTube，反應熱烈，收看次數高達五百萬，及後

更在電視台播放。另一項為紀錄片「拜根鐵路」，長達七小時，將攝影機放置於火車前端，由拜根至奧斯陸，全程371公里，拍下沿途景致，在挪威廣播公司第二台播放，極受歡迎，更由此衍生一連串後續製作。有興趣者不妨登入YouTube網站，以「One Year In 40 Seconds」及「Bergensbanen」搜尋，即可收看。



更在電視台播放。另一項為紀錄片「拜根鐵路」，長達七小時，將攝影機放置於火車前端，由拜根至奧斯陸，全程371公里，拍下沿途景致，在挪威廣播公司第二台播放，極受歡迎，更由此衍生一連串後續製作。有興趣者不妨登入YouTube網站，以「One Year In 40 Seconds」及「Bergensbanen」搜尋，即可收看。

葡萄牙的羅卡海角(Cape Roca)為世界著名地標，那裡是歐洲大陸的最西端，臨海之處，在十字架紀念碑上，刻上了詩人的名句：「這是陸地終結，也是海洋起始。」那裡巨浪拍岸，冷風清勁，崇尚冒險精神，促使葡萄牙的船隊奔向探索的年代，航海如是，開拓公共廣播的新天地如是。

【→】陳耀華

香港電台第一台節目總監

國際會議呈現華語電影

由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媒介與傳播研究中心和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合辦之國際會議「華語電影工業：方法與歷史的新探索」，於2010年10月8日至10月9日成功舉行。是次為期兩天的會議致力呈現華語電影工業的最新研究進展，並探討新的研究方向。主題包括對華語電影工業西化傾向的重新思考、影業首都與區域電影的關係、電影巨頭公司的個案研究、觀眾研究的新方法等。來自香港、大陸、台灣、日本、新加坡等地的二十餘位知名學者在會議上呈現並討論了他們的最新研究成果。



發現華語電影中的「失蹤者」和「被失蹤者」

華語電影歷史研究近年來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但也存在不少問題。復旦大學教授馮筱才就指出，由於種種局限，當下華語電影史中有諸多研究者被忽略的「失蹤者」或避而不談的「被失蹤者」。研究者們重視文本分析，而忽略觀眾研究；重視導演和明星，而忽視其他從業人員；重視上海、香港等主要城市，而忽視小城鎮和鄉村；重視解放前和新時期的電影，而忽略1949-1976年這段特殊時期內的電影等。這些局限成為構建全景華語電影史過程中的巨大障礙，也開始引起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們的關注和反思，事實上，這次會議上的許多成果都在探尋華語電影中的「失蹤者」和「被失蹤者」。

如深圳大學的劉輝教授選取了「華影」這一「失蹤者」，由於歷史原因，1937-1945年間日本軍方在中國成立的電影機構「滿映」和「華影」一直未得到深入的研究，甚至一些學者對這些機構能否進入學術研究視野都持激烈的反對態度。而劉輝基於在中國和日本兩地搜集的大量史料，對華影的機構框架進行了富有開創性的研究。

台灣輔仁大學的唐維敏教授同樣選取了一個曾被歷史遮蔽的研究課題——戰時重慶電影。他認為戰時重慶國共兩黨旗下電影人在政治影響下的互動，深刻地影響了他們日後的思想、創作乃至命運。探討華語電影發展的延續與斷裂，可以從戰時重慶電影中找到一些有趣的線索。北京電影學院教授楊遠嬰則選取了北京電影製片廠這一獨特個案，對其1949-1966年間的體制構建、創作策略、類型樣式、導演群落、電影行銷等方面進行了細緻的勾勒，揭示了其表現出的「社會主義電影的特徵」。

重探香港影業在華語電影中的位置和特徵

在華語電影的跨國流動中，香港影業長期處在重要的樞紐位置。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融會各地電影人、各種語言和文化的樞紐位置深刻形塑了香港影業的多元特徵。而這些特徵正得到學者們越來越多的研究。在這次會議上，就出現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如香港資深電影文化工作者羅卡先生就將目光聚焦於香港電影的通俗娛樂特徵。他細緻梳理了1946-1950年間上海和香港兩地通俗娛樂電影的發展史，比較了通俗娛樂片在兩地不同的政治經濟環境影響下表現出的類型特徵和市場接受情況。他認為比起政府管制自上而下發展出的官方文化藝術，根植於民間、由下而上發展的通俗文化具有更大的活力，這也是香港電影繁榮的重要原因。



在香港電影業中，長期並存著多種語言製作的電影，不同的語言及其背後的文化傳統決定了電影不同的接受群體，進而決定了電影不同的製作模式。香港浸會大學博士生吳月華就

工業研究新方向

通過對粵語歌唱喜劇的觀察，探討了粵語電影以「混雜」為特徵的製作模式。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容世誠則聚焦於香港影業中另一獨特片種「夏語片」，這種配以閩南方言的電影，在1950年代曾非常繁榮，其資金大部分來自東南亞的閩南華人商家，拍攝的地點是香港影廠，不少攝製人才來自上海，但影片卻極少在香港本地放映，銷售市場主要針對星馬、泰國和菲律賓的閩南華人族群，形象地說明了香港影業的「跨國性」特徵。而這種特徵也同樣體現在香港浸會大學鍾寶賢教授對邵氏影業公司的研究論文中，她描繪了邵氏影業在1920年代到1950年代間以上海、香港、新加坡三地為基地發展壯大的歷史，從而呈現出華語電影在亞洲市場開疆拓土的過程。

拓展華語電影研究視野與方法

在意識形態的束縛和諸如《中國電影發展史》之類經典著述的影響下，關於華語電影的歷史敘述中存在不少成見，有待深入的反思。而這次會議中就出現了不少突破陳見的新觀點。如日本關西大學教授菅原慶乃就用充分的史實有力反駁了1926年7月六合影片營業公司的成立是為了把天一等影片公司排擠出電影市場的一貫說法，還原了它們之間既有競爭又有合作的歷史真相。

中國藝術研究所研究員秦喜清深入反思了學者們在研究好萊塢對中國影響時存在的「西方中心論」思維，她從理論和概念上厘清了研究好萊塢電影對中國影響的幾種傾向，並借用柯文(Paul A. Cohen)的「中國中心觀」指出中國電影研究應使用一種「中國視角」來開啟新的面向。加州州立大學聖馬克斯分校蕭知維教授則在某種程度上實踐了「中國視角」。他基於大量的資料和事實，把好萊塢對中國的影響落實好、具體化，指出在中國不同的區域，在鄉村和城市，好萊塢電影的傳播狀況以及中國觀眾接受好萊塢電影的程度是非常不同的，強調了中國本土文化和觀眾的能動性。

此外，這次會議中的一些研究也呈現出了新穎的方法論取向，如台灣國立政治大學陳儒



修教授帶領他的學生，採用商學研究中的集中度測量方法，調查並探討了過去20年間台灣電影產業集中度狀況，從一個新角度反映了台灣電影產業的變遷。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的張慧兒博士則借鑒傳播學的相關研究成果，探討了對數位時代的電影觀眾進行研究的新方法。

合力構建新華語電影研究體系

據本次會議組織者香港浸會大學葉月瑜教授介紹，舉辦這次會議的初衷是為各地的學者搭建交流平臺，共同思考華語電影研究的未來。隨著中國在世界的位置越來越重要，華語電影研究也正成為一個熱門的研究領域，呈現出跨學科、多元化的發展態勢，但蓬勃發展的同時也充滿了問題和挑戰，如華語電影研究中的諸多「失蹤者」和「被失蹤者」還有待填補，早期華語電影的史料還有待深入挖掘和整理，舊的分析框架還有待突破等，而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離不開各地學者的通力合作。

葉教授還提到，這次會議屬於由她牽頭的一項早期中國電影工業大型研究項目的一部分，項目主要致力於從香港、杭州、廣州、天津、重慶等地的地方文獻中挖掘新的電影史料，相關成果將在今後三年內陸續出爐，並將建設一個中國電影工業線上資料庫，與學術界共享研究成果。

【+】 彭侃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研究生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中國新聞封鎖 新聞自由度香港排名上升

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十月初獲頒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被視為是西方世界自1989年「六四事件」後，對中國人權狀況作出最直接的抨擊。挪威諾貝爾委員會表示，頒獎給劉曉波是要表揚他長久來用非暴力形式在中國為基本人權作抗爭。但中國政府對劉曉波獲獎實施新聞封鎖，據報英國廣播公司新聞頻道和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在直播公佈時在中國的傳送中斷。



但有本港電視台捷足先登，在挪威諾貝爾委員即將宣佈結果時，與劉曉波妻子劉霞進行連線

電話採訪，讓劉在第一時間得到丈夫獲獎的消息。但香港的新聞媒體要跟進有關新聞亦受到限制，如傳媒訪問劉霞便被多番阻撓。

無國界記者組織在十月下旬發表2010年全球新聞自由度排名報告，在178個國家和地區中，香港在兩岸三地排名最高，列第34位，而台灣位居48，兩地的新聞自由度有所改善。香港記協發言人指香港的情況，或與公眾監督傳媒能力提升、令傳媒更自省有關；而中國大陸則排第171名，列倒數第8位，僅在緬甸、朝鮮等國之前。無國界記者組織指稱：「儘管中國的媒體和網絡活躍，但新聞審查和壓制仍持續不斷」。香港業界擔心，內地新聞自由度低落，令本港記者在內地採訪的難度愈來愈大。

[+ + + + + + + + + + + + + + + + + +]

報評會十周年望提高傳媒操守 香港衛視啟播新搞作

香港報業評議會今年已踏入十周年，十月

中舉辦了一個研討會，主席陳韜文教授表示，現今新聞傳媒面對三個主要問題，包括新聞自由、新媒體衝擊傳統媒體，以及傳媒專業操守問題。他指出傳媒有專業一面，受到不少市民的信賴和倚重，但正因為傳媒影響力巨大，一旦操守出了問題，其惡劣影響亦顯而易見。因此傳媒的倫理道德特別需要關注，因為與新聞自由、以及媒體的公信力關係密不可分。香港報業評議會過去十年共收近2,500位公眾對報刊的投訴，對被裁定違反操守的傳媒共發出18宗公開譴責。他希望報評會繼續加強監督業界工作，提高傳媒的操守意識，並積極地進行普及傳媒教育。



一個全新的衛星頻道香港衛視在十月初正式啟播，將會在電訊盈科的收費電視平台免費播放。主席高洪星稱，籌備香港衛視約兩年，投資逾10億元，料於一至兩年內可錄得營運溢利。原從事金融業的高洪星稱，頻道節目雖以普通話為語言，但主持均為外籍人士，希望用西方人的思維方式解讀東方，融匯兩地文化，成為頻道主要特色。他稱已計劃投資逾2億元，又希望香港衛視可於三至五年內上市。香港衛視目前只有一條頻道，日後會增至5條，



目前在香港、部份東南亞國家可收看，大陸仍未可以落地。集團同時亦希望開拍電影《三國荊州》、並在湖北省投資主題公園。

[+ + + + + + + + + + + + + + + + + +]

廣管局正式調查無綫濫用支配性優勢 亞視播《娃鬼怪嬰》遭警告

廣管局十月中正式展開調查電視廣播被指濫用支配者優勢而違反競爭行為的投訴，調查委員會在首天會議上已擬定調查大綱，計劃中要求無綫電視持牌人及相關人士提供進一步資料，以及邀請熟悉反競爭的學者及經濟專家，並會聘請大律師參與，預期調查專案隊伍在十一月組成，有分析表示，類似的案件在歐美國家動輒要一至兩年才可完成，而在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尋求賣盤時期被調查，市場關心會否影響賣價。其實針對TVB反競爭的投訴存在多年，在過去亦收到這類的投訴，不過當時並無成立調查小組跟進，今屆廣管局認為事關重大，不欲有違反競爭的情況出現，故決心做好「球證」的角色。

此外，廣管局又裁定亞視國際台今年六月七日晚上九時播放恐怖電影《娃鬼怪嬰》違反



守則，於是向亞視發出警告。廣管局指有關電影內容以邪惡及殘忍的報復行為作主題，並描述人形玩偶任意殺人為樂，屬暴力恐怖片，即使被列為「家長指引」類別，亦不適合在晚上九時播放，促亞視應嚴守

相關條文。此外，繼上月裁定商台播放民建聯贊助的《十八全人愛落區》首兩集節目屬政治廣告而判罰3萬元後，廣管局再裁定該節目第3至6集違反《電台業務守則》，但因商台已接受懲處及停播節目，故毋須再作懲處。

[+ + + + + + + + + + + + + + + + +]

發放突發資訊警方有新措施 香港電台未來發展仍有變化

警方04年實施通訊數碼化，令傳媒無法

監聽，記協早前指警方每天平均只發佈2.7宗突發事件，是每天平均罪案212宗的1.27%，與最初承諾每天公佈100宗案件相距極遠，而警方接報20分鐘內公佈突發事件的承諾也未兌現。十月初香港記者協會與多家傳媒代表與警察公共關係科會面，商討改善突發資訊發放安排。警方同意由十一月開始，嘗試改為單以英語發放突發信息的「編輯注意」稿，省卻翻譯時間，試行一個月後檢討成效。警方希望此舉應會加快突發信息發放的時間和增加發放的數量。警方亦承諾研究在刪除當事人個人資料後，不經篩選發佈消息的可行性，但未有具體實施時間。記協表示會繼續跟進警方研究的進度，希望警方在過渡期內繼續改善資料發放。

立法會小組委員會十月中討論《施政報告》中有關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的措施時，有議員詢問香港電台日後會否提供新頻道予團體發聲，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指政府正計劃預留資源，引入新的聲音數碼廣播平台，給不同團體透過此平台發聲，到時港台將繼續貫徹編輯自主的方針，並信守廣管局的一般節目守則，團體製作的節目內容不會受到港台干預，港台只會向團體提供技術支援。至於團體申請在港台新頻道播出節目的詳情，將交由港台的顧問委員會討論，並向廣播處長作出建議。

香港電台要迎接經營數碼頻道的挑戰，但政府對廣播處長的任命遲遲未見公佈。傳媒十月下旬傳出現任廣播處長黃華麒於明年初約滿後，以私人理由向政府表示不再續約廣播處長一職。黃處長對此不置可否，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表示政府會作出安排，然後公佈。而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表示，希望處長一職由認同港台使命的人選出任，並應考慮由內部晉升。

[->] 梁麗娟
傳媒評論員

【+】 FRIENDS WITH BENEFITS

Networks all over the hipness scale are turning to social media to communicate with viewers and build larger, more engaged audiences for their shows. While doing so, they are getting the added benefit of accumulating enough followers to attract the interest of their advertising clients.

BROADCASTING & CABLE

October 11, 2010

【+】 A GOLDEN FUTURE

The National Public Radio in US has recently launched Argo, its pilot project creating Websites that aggregate local and national news according to various themes. To a Web surf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multimedia news site run by a public radio group and one run by a local commercial TV or radio station is zip.

BROADCASTING & CABLE

October 11, 2010

【+】 WHAT'S NEW FOR DVB-H?

Recently,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companies submitted technology proposal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handheld (DVB-H) systems for delivering TV to mobile devices, and a team of technology experts is about half way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orting through them.

ASIA PACIFIC BROADCASTING

October 2010

【+】 GEARING UP FOR 3D DEMAND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to broadcast 3D TV content, even uplink facilities need to be sure that their infrastructures are now capable of transmitting large amounts of data, in the quickest way possible. Broadcasters and mobile earth station operators have begun climbing the "learning curve" on producing and transmitting live 3D TV broadcasts.

ASIA PACIFIC BROADCASTING

October 2010

【+】 三網融合加劇網絡視頻市場競爭

用戶數量基礎和業務的快速增長，使得網絡視頻產業市場成為近年國內的投資熱點。傳統媒體、綜合門戶網站、電信運營商競相進入，新興網絡視頻網站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再加上三網融合政策的突破，網絡視頻市場的競爭愈演愈烈。

《世界寬帶網絡》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

【+】 省級廣電：從「集團化」到「台化」

去年上海廣播電視台、上海東方傳媒集團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標誌着上海在全國率先整體實施廣播電視制播分離改革。近一年來，遼寧、四川、北京、湖南、山東等省級廣播電視台也紛紛掛牌成立，而原來於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建立起來的事業性質省級廣電集團則同時撤銷。從「集團化」到改為廣播電視台的「台化」，改革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它對中國廣播電視事業和產業發展有什麼積極意義及影響？這是否今後省級廣電改革的方向？

《南方電視學刊》

二零一零年第三期